红色电波从太行山上传出

——纪念新华社临时总社和接替陕北电台广播五十周年

肖　风

1947年3月30日，距今已有50年。这一天在太行山上，传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真理声音。这就是接替陕北新华电台广播的最强音。

这一声太行山上真理声音，告诉我们：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接受党中央的委托，在创刊十个半月的《人民日报》的基础上，筹建了新华通讯社临时总社；并在创办六个半月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的基础上，接替了陕北新华电台的播音，传播了党的真理声音，传播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

这已经是整整半个世纪前的事了。

一、新华通讯社临时总社的组成

新华通讯社临时总社，由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筹建，设在离《人民日报》驻地约四、五十里外的豫北（现为河北）涉县西戍村。

1947年春，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已告失败，企图几个月内消灭解放军的幻想已经破灭。只得在山东、陕北西翼前进，叫嚷所谓“重点进攻”，梦想一举夺取延安圣地，以为这样就实现了消灭我党的“全面胜利”。党中央电告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由晋冀鲁豫解放区负担接替新华通讯社总社和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工作。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为使红色电波照常传播，在人力、物力异常困难下，毅然接受党中央的委托，肩负这紧迫而艰巨的光荣任务。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立即着手筹建战备总社和战备电台，准备在党中央撤离延安以后，一天也不停地接替总社和电台的工作。不让文字广播和口语播音中断。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委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敏(即杨放之)同志负责筹建临时总社,委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同志协助吴敏同志工作。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于 1946 年 5 月 15 日，社址设在邯郸市。中央局宣传副部长张磐石兼任《人民日报》社长。

在筹建《人民日报》时,从太行《新华日报》调来 安岗、袁勃、左漠野、李庄、杜波、吴象、齐语、柯岗、王友唐、袁毓明、郭渭等；从太岳调来古维进、刘希龄等；从冀南调来张更生、林里等；从冀鲁豫调来艾方、中流、陈勇进、姚力文等。这是支人数少、素质好、作用大的基本队伍,还从太行《新华日报》、太行先锋剧团、太行文联、北方大学，还从中原突围来晋冀鲁豫的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中，挑选干练人材，一起分配到临时总社，以及邯郸新华广播电台。

著名播音员齐越同志在《播音员日记》中写的是： 1947 年 3 月 30 日,西戍村“接受新任务”。中午,晋冀鲁豫总分社,负责人安岗同志从中央局开会回来，传达党的决定：立即抽调一部分电务、编辑人员前往太行西戍，同其它方面抽调的人员汇合，组成新华社临时班子，从 4 月 1 日起接替陕北新华总社对国内外的文字广播和口语广播。

任务异常紧急，组织上派张更生、李洋和我打前站，限天黑以前赶到，准备好一切。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用实际行动“保卫

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时候了。我们以每小时十里速度，在六点左右赶到四、五十里外的山村西戍。……

3月30日—4月1日，临时总社的人员先后到齐，接受工作。这就使得新华社的呼号“CSR—XNCR”和陕北电台的呼号“XNCR”同时在太行山上空飞向四面八方。

临时总社由《人民日报》调来的人员，有编辑、外文、电务、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同志。其中有左漠野、吴象、李庄、罗林、高飞、安文一、张连德等；还有由中原突围来的王晶垚夫妇；从北方大学分到《人民日报》的齐越、李洋以及陈坤、陈理昂等外文人材；还从军区政治部宣传科抽调了科长钱抵千，负责发英文报的工作。

当时，在中央局宣传部工作的，还有新华社特派记者朱穆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陈泽然、太行的张则孙、太岳的王中青、宣传科的黎砂、于韵琴等同志。为了接替工作，朱穆之也调到了临时总社。高飞负责发报台的工作，当即赶到沙河村电台驻地。张连德、安文一原是太行《新华日报》电务科长，刚调《人民日报》任职，现在又到了临时总社。张连德到达后，负责抄收英文电报。塔斯社的英文电报，是临时总社国际新闻的主要来源，张连德一人收报，专心致志，毫无差错。

安岗、李庄负责解放区建设和解放战争的报道；朱穆之负责国内、左漠野负责国际两方面的报道。

临时总社的评论和重要战报等，由陕北总社发来，然后经临时总社在沙河村的电台发出。当时的新华社社论、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谈话，全国战局的分析等等重要稿件，全由新华总社在陕北的“亚洲部四大队”发给临时总社。党中央的内部指示，党的宣传方针及意图，都由“四大队”用密码发到临时总社。陕北跟随党中央的总社由范长江负责。范长江同志远在千里之外，非常关心和爱护在太行山上的临时总社的同志，经常给临时总社通报党

中央的指示和解放战争情况，使临时总社在接替期间，方向明确，编辑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9月 11 日，长江写给总社廖承志同志的信，讲述了中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的艰苦朴素、严谨认真的作风，鼓励总社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学习，使总社同志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做好党交给的宣传任务。

二、接替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从 3月 29 日起，已经转移到太行山上的涉县沙河村(离西戍村五里)。这天晚间,因为陕北电台呼号没有出来，就由邯郸电台的女播音员于韵琴连连呼叫 XNCR ,声称扬器发生故障，停播。30 日，就由沙河村的“陕北电台”播出陕北电台的广播。真理的声音从未中断。

邯郸电台接替陕北电台的准备工作，是从 3 月中旬开始的。3月 8 日,革命圣地延安,召开了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把这一讯息广播到全国。位于沙河的邯郸电台也就收听到了这一重要新闻。邯郸电台的同志们积极展开了“保卫党中央”的学习。正在这时，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通知：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完成接替陕北电台的播音准备工作，保证延安电台（后改陕北电台）的广播不能中断。

邯郸电台 1946 年 9 月 1 日开始广播，到这时只有半年时间，编辑部的工作，才开始组建。行政、机务、编辑、播音等人员不到 20 人，其中编播人员不到一半。接受陕北电台的任务，确实困难重重。但是,全体同志深切地认识到延安电台肩负的向全国、全世界宣传任务极为重要，接替工作是一项崇高的政治任务。一致表示：一定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努力从思想上、物质上、技术上、工作上做好充分准备，用实际行动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

毛主席，不失时机地把党中央的声音，把爱国自卫战争的胜利喜讯，传播到天南海北去！

3月 15 日前后开始，邯郸电台分成机电、编播两个部分，在台长常振玉、三处处长王士光的领导下，开展准备工作。 3 月 25 日，发射台、发电机、定向天线，一系列的播送红色电波的系统，经过日日夜夜的努力奋斗，已经全部完成试运转、试播送，效果良好，达成了预期的要求。

编播方面，主要是增强编播力量，试编全国性的广播稿；确定播音人员，练习播音，既要达到原陕北电台的播音水平，又要有原播音员的感情、口音和语气。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调到《太行新华日报》的刘江、张荣安、荣一农，太行文联的郑笃、刘晓晞，太行先锋剧团的纪青，以及兰林、曹菲亚等分派到电台担任编播工作；还调了刚到达人民日报的中原突围的顾文华，延安转移来的田蔚和《人民日报》的编辑胡迦陵等。

当时，晋冀鲁豫地区电台为一、二两台：一台是“陕北台”；二台是：“邯郸台”。一、二两台分由总编辑萧风、副总编辑顾文华领导主持工作。一台的播音员于韵琴、兰林一南一北，和陕北台的孟、钱两位播音员口音相近，真可以“以假乱真”。

设备、电源、播音、编辑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几乎在同一时间基本完成，只待一声令下，随时可以上阵。

1947 年 3 月 28 日，陕北电台广播了青花砭大捷的新闻，收听的编播人员都很高兴。但是，29 日晚，收听的编播人员一直等到 19 时以后，才突然有一个粗哑嗓子的叫喊 XNCR ,连喊好几声后，就再没有声音了。这时大家都很惊诧、气愤，异口同声的斥责说，这是敌人的假冒！纷纷要求接播 19 时 30 分左右，发射台开动了，播音员的声音出来了，是于韵琴。她呼叫着 XNCR，反复连续呼叫了几次，就把机器关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天—3月 30 日，经过请示，邯郸电台就按时正式接替了陕北电台的全部广播节目，及时地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人民解放军战争的胜利消息播送到大江南北，贯彻执行了“保证陕北电台的广播不能中断”的指示。而播音员的口音、语气、感情也都和原播音员的逼真。有谁能够猜到，这是在太行山小山沟里飞出的声音，通过红色电波，传播到听众的耳鼓里呢？

4月 21 日，一、二两台合室进行‘检查总结”。会上传达了 20 日新华通讯社从陕北发来的指示。这个指示，首先表扬了陕北电台接替后的广播：一、播音有感情；二、口语化好；三、播音速度合适；四；编写简要。这些表扬鼓舞了接替陕北电台的编播人员。当时根据指示对不同的内容，研究了节目安排，以求精益求精。这是邯郸电台接替以来第一次接到新华总社的指示，全体接替人员得到一次很好的教育。

陕北电台编辑部负责人温济泽同志和播音员钱家楣同志，从陕北出发，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爬山涉水，行程千里，于 4月 25 日左右，到达了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同志接见了他们，安排他们前往沙河村驻地。他们到达后，温、钱两位分别接手了萧风、兰林的工作。至此，邯郸电台的接替工作告一段落；编辑人员尚在途中，不久才能到达。

陕北和邯郸两个广播电台同台广播，出乎听众的意外，也出乎国民党反动派的意外，使国民党军队的测试人员也不敢“谎报”陕北电台就在太行山上。据陕北解放军在 4 月初俘虏的一个旅的无线电测向台台长叶某供认，他的任务是测试延安广播电台的位置，从而判断我党中央转移的方向。3月 15 日，发现延安电台转移到瓦窑堡方向，报告上级。3月 29 日到 30 日，发现转移到东南方向，叶以为这不大可能，如果从实报告，将会受到惩罚，只能谎称是转移到延安的西北方向。

这就可以看出，当时陕北电台的位置是这样重要。它离开陕

北，使得敌人不能依靠测向，了解我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位置以及动向，这对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是多么重要。

1947年夏，据杨兆麟、赵玉明草稿《延安（陕北）广播史话》称：“在太行时期，陕北台的广播室宣传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同志的关怀和重视。 1947年 7月的一天、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视察了陕北台和邯郸台。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了汇报以后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现在全国大反攻开始了。我们的部队已经过了黄河。我们很快也要过河去。部队过河以后，看不到报纸，要得到消息，就靠你们的广播了。我们在行军和作战中每天都要派人抄收的。’ ……”因而邯郸台在 8月 1 日，增加了“对本军”的记录新闻，好让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能够知道党中央和解放军的情况。1948年元旦，又增加了播送军属家信，让解放军官兵能够得悉家里的情况，安心杀敌。这两项广播，就是遵照邓小平政委的指示安排的。这对前方官兵的鼓励和教育是很大的。

三、总社全部人员到达西戍

陕北总社的人员，从清凉山到太行山，经过了大青山、五台山，长途行军，冲破敌人重重封锁，转战了 3个月，到达临时总社驻地——西戍。梅益、石西民两位同志，见到了磐石同志，面谈了临时总社和陕北电台的合作，两个台的编辑部的驻地等等。

这时,总社的领导人员有廖承志、徐迈进、石西民、梅益、祝志澄同志共五人，成立社务委员会。组织机构也有所调整：总编辑室主任由吴冷西担任；解放区部由朱穆之任主任；蒋管区部由廖盖隆任主任；国际部、翻译部、对外部由黄操良、陈龙、程适吾等分任主任 陕北电台编辑部在 6月下旬由沙河村迁到西戍村，主任是温济泽，副主任是胡若木，由负责领导广播工作的梅益同志领导。

当时，陕北电台编辑部的人员有：杨兆麟、左荧、刘衡，还有《人民日报》的王晶垚夫妇和高而公；播音员孟启予（组长）、钱家楣、夏沙等。6 月 26 日，陕北电台编辑部迁移到西戍村，由临时总社统一领导。

8 月间，梅益同志又为陕北电台挑选了一位男播音员齐越。

7 月初，廖承专同志率领新华通讯社总社的最后一批同志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直奔豫北涉县西戍村。工作人员安排就绪，临时总社即行改为正式总社，由中央和中央局双重领导。廖承志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中央局宣传部长。人民日报和邯郸电台在“陕北电台”接替工作的同志，都陆续回到原来单位。

9 月 11 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在陕北写了一封信给廖承志同志，由沈建图同志带到总社。这封信内容，摘录如下：

“总社同志们远离中央，艰苦工作，积极热情，大家都很称赞。就建图同志前来之便，敬向你们全体同志带上我的热烈慰问之意。……言论方面，务望：（一）谨慎，宁可多想想，多看点材料，然后才下笔。（二）文字要求简洁易懂，要有内容，不要，‘有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三）言论的基本工作，即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望切实抓紧，须要花些钱，做一些装材料用的家具，这方面万勿吝啬。”

“电台工作务望加检查和改进。这是唯一的传播工具，不弄得十分好，就会影响一切。其办法我已告沈，你们还可以讨论更好的办法。问题是花力量去做。”

“还有几件小事，亦望注意：（一）广播的转播，设备不好，也和国民党差不多。会后望告各地，不能播则已，要转播，技术上必须花本钱，否则是浪费，是叫人不要听。（二）因敌人经常扰乱，广播员以女的为好。你处的男同志广播，口音较好，但在敌人扰乱时就听不到，而女音在扰乱中还可听到。（三）现敌对我们的文字广播，亦故意扰乱。重要文字，各地收得怎样？如何不受影响，

望究办法。”

四、一支攻无不克的技术队伍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给廖承志同志的信中，告诉同志们：电务工作务望严加检查和改进。这是唯一的传播工具，不弄得十分好，就会影响一切。

新华通讯社总社的中、英文广播，陕北电台和邯郸台的口语广播，都要依靠这“唯一的传播工具”。尽管中文写得生花，英文编得熟练，电文翻译得一字不错，口语广播得口齿清楚、感情极佳，如无载体传播，都会要变成空话。因此，必须有一支技能很强的机电队伍。这支队伍，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就是军区三处后为三局的技术人员。三处的副处长大王同志（王士光同志，因长得高人，人又和气，故大家都很喜欢他，亲近他，习惯称呼他为“大王”),就是这支队伍的领头人。大王同志坚韧不拔,技术精湛，为晋冀鲁豫解放区党的广播事业，贡献了极大的智慧和技能，尽心尽力，完成了党交给的机电重任。

1947 年 3 月 6 日,《人民日报》第二版,载有《人民电机工程师——记模范电讯技术人员王士光》，表扬王士光同志的功绩。同年 10 月 3 日，《人民日报》又载有一篇表扬“电讯部队”的通讯：《白手起家的电讯部队》。这篇通讯讲到了邯郸电台：“1946 年，他们把一部（实是两部）缴获的机器改装成了闻名全国的邯郸广播电台。为了这个电台的诞生，以王士光同志为首的技师同志们，每天都紧张地工作到 12 小时。最后，王士光同志勤劳得病倒了，但他没有停止工作，而是把床抬到机器旁边继续进行研究。不少人劝告他停止工作，都被他拒绝了。他说：‘因为身体而停止工作，这是我的耻辱……’。大家也都没日没夜的干，吃睡都在机器旁边。有时太疲乏了，就靠在机器旁睡一会。同志们说：“现在苦一点，

累一点，正是为了搞好广播，唤起民众，争取爱国自卫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的技术人员，就是这样地用艰苦奋斗，一丝不苟的革命精神，校检仪表，改装机器。从改装起，一直搞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终于把两部美制导航机（又名‘归航台’）改装成口语广播发射台。他们攻无不克地改装成发射机，建立了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又在 1947 年 3 月，改装了一部发射机，接替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其功劳的卓越，值得在党的新闻广播事业史上刻画下不朽的一笔。

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这两部美制“归航台”是怎样来的呢？原来是蒋介石“运输大队长”依靠空运、海运为维持东北、平津的交通运送来的。当时，蒋军的飞行驾驶员，飞到焦作就以为是新乡，冒然降落，谁知等着他们的却是解放军驻军和民兵。这样，就成了人民的胜利品。这样的胜利品，两、三个月后，成了人民的喉舌，载着红色的电波，飞到了四面八方。半年以后，其中一部，成了党中央的广播电台。其后，又改装了一部，轮流使用，直至全国胜利。

整整 50 年过去了。这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什么事都能办到，什么事都能从小到大办好的革命精神，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力量的源泉！在新中国的新闻史上，树立有这样的丰碑，刻画着这样的一笔历史，谁也抹不掉，谁也忘不了！

早年的新闻活动及作品特点

周　洁

报纸帮助他成才

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经历，有的庸庸碌碌，有的平步青云，有的坎坷曲折，有的充满传奇。往往一个偶然的机遇，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这里，我想给青年朋友们讲一个故事：

1935年的圣诞节刚刚过去，天津《益世报》的一位编辑接到一封读者来信。写信人是天津市汇文中学高中三年级的一位学生。信的全文如下：

编辑先生：

“寒假能做点什么？”

这个问题在我的脑中已经起伏了许多次。尽念学校所规定的书本，也是个好办法。因为这样可以使我的学习分数增高，可以教我记住许多的“公式”。不过，想来想去，总觉得对一个明年便要跨进“最高学府”，特别是新闻系的“我”，有些不适宜。

现在，我感到，我急切需要的，不是死的“公式”、死的书本（虽然在开学后我仍要抱着它去‘啃’），而是‘看看社会与发现社会上各样人物的不同生活、经验及见解。”

在我想到这两个问题时，我曾有过以“难作”二字而忘掉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后来终于又鼓起了我的勇气，为什么许多的事物全在我面前摆着，而却没有勇气去做一点小事呢？

在惭愧与兴奋的交织中，我想到您。我认识您是从前年您在我校讲课，您告诉我们从事社会事业服务的经过。同时，您还给我们阐明“何谓社会服务”。那时您的话，只是暂时地充实我的耳朵，想不到我现在却完全想到它。

编辑先生，我要做些不要酬劳的工作。这工作便是我最感兴趣的，也是最合适于我现在的，就是在您眼中已经变成平平常常的“访问”工作？

您听了或者要高兴吧。您这个小同学希望您能尽心帮助他。

我校一共有 7 个星期的假。在这 7 个星期内的每一天中，半天我要作投考燕京大学或中央大学新闻系的科目的准备，半天我要在您指导下做一些“新闻记者的实习”。

关于访问，我先按以下三个目标去做：

一、教员（包括大、中、小学的）；

二、实业家（新兴的实业的创始者）；

三、艺人（如画家、雕刻家等）。

以上只不过是一块模糊的版，希望您能尽善美地把它修改好。换句话，就是热心地供给意见。

或者您以为我的“想做之事”，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的“幻想”。我知道层层的困难多而又多，不过我仍希望您帮助我去与这困难见面，因为，我现在早存了“始终不懈”的决心。

谈了很多，可是您仍不知道“我是谁”？真是件可笑事，好，现在让我把我自己介绍一下：

我叫安正元，我生在河北，祖与父全是商人。从很小起我便开始念“老书”，直到 15 岁，才有上中学的决心。16 岁暑假致力英语、算术。得了一个友人的帮助，乃一步上了本市某中学的高中一年级。后来投考汇文中学，今已高三。您瞧我的生活变化得

多么有趣呀。

末了，我希望在您指导下能够作为我从事新闻事业的起头，为了您的社会服务，也为了培养我成为一个新闻人才（当然，那仍须我努力），我没有公子哥的脾气，少爷的性子。我只有两只肯做活的手，一副冷静的脑子，一枚热烘烘的心。

你肯帮助我吗？

安正元写于圣诞节后

（通讯处：天津东南城角邱家胡同九号）

随信附有一份访问提纲。

这位编辑怎么也没有料到两年前的一次讲演，能在一位未成年的男孩心里播下理想的种子。如今，种子已经萌发新芽，它正推动着这位年仅 17 岁的青年走出书斋，到生活中去“发现社会上各样人物的不同的生活、经验及见解。”促使这位还带有几分稚气的青年献身社会服务事业，决心当一名新闻记者。

这位编辑为能够得到这样一位“小同学”，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将这封信和访问提纲全文刊登在天津《益世报》1935 年 12 月 29 日第九版上，标题是：“一切青年都该想想‘寒假做点什么’”。并且加了编者按：

编者按：我读完这封信，非常高兴，我很希望把我所能知道的告诉你，帮助你实现你的理想。

明年 1 月 4 日上午 11 时盼你准时到馆，先作一次谈话。

你采访来的稿子，本版可尽量给你发表的机会。这样，你自己可以练习；同时，也就是为社会服务，而这种材料，也还正是本编辑部需要的。

“寒假做点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我希望其他的青年，也能如安君一样，找些应做、爱做的事情做一做（当

然自修也是重要的）庶几这 7 个星期的光阴，不让他白白过去。

报纸编辑的支持和鼓励，给予安正元极大的勇气。他首先到河北工学院采访了一位讲师兼造纸学家杨十三先生。当他的处女作在 1936 年 1 月 11 日见报时，编辑加了一个很热情的按语，称赞他“第一次稿件来了，写得很不错。我们觉得他的确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

学校刚放寒假，安正元聚集 4 名好友，离开天津，走向广阔的农村，去探索“课本以外的无上珍品——真正的社会经验。”他们一个村庄走向另一个村庄，访问了学校校长、教员、老农夫、乡长、警官、工厂厂长。报纸以“汇文学生安正元君利用春假访问农村”为题，作了连续报道。《益世报》陆续刊出安正元寒假采访的报道计 16 篇近 4 万字。

安正元初露头角，便显示出他从事社会活动的才华。报纸的支持，更坚定了他要当一名新闻记者的决心。这年夏天，他高中毕业了。他告诉家里人说，到北京去考燕京大学新闻系，父亲以无法形容的喜悦送他上路，毕竟在 10 个儿女中只有正元念到高中啊！然而老父亲怎么也没想到儿子这一走，竟然杳无音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正元上哪儿去了呢？老父亲想念爱子，终于为爱子的“失踪”而神经错乱。

安正元，正投身沸腾的战斗，踏上了人民革命的征途。在革命队伍里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人民记者。

当我听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为当年那位《益世报》编辑的惜才之念、爱才之心、助才之力所深深感动。我想，假如那位编辑对安正元的信漠然置之，投进纸篓了事，安正元能成为新闻记者吗？假如这位编辑不是那样热心地同安正元侃侃而谈，多方指点，安正元能在一个寒假里写出近 4 万字的通讯报道吗？假如报纸不舍得拿出版面来刊登一位有志于从事新闻工作的青年的作

品，这位青年能成为出色的新闻记者吗？诚然，社会环境有时候决定一个人走什么样的生活道路，但启蒙者的指点，往往在青年人确定理想的一刹那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们现在的报纸编辑部里，每天也能收到许多青年的来信，我们的报纸编辑，能否在青年读者中发现、培养一批将来能胜任总编辑的人才呢？

写出人物的闪光思想

安岗主张记者要写人,要写有思想的人。安岗的记者生涯,就是从写人开始的。当时他还是一个 17 岁的学生，当在 1935 年圣诞节前，他给天津《益世报》编辑部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明想做一名新闻记者，并随信附去一份人物采访的提纲后，报社编辑愿意帮助他实现理想。从 1936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15 日，在短短的 34 天中,发表了安正元的 5 篇人物专访。这些作品，目前都收入在当代中国记者丛书《安岗新闻通讯集》一书中。

安岗早年写的人物通讯，以他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发掘，不仅抓取了每一个人物外表的特征，而且展示了他们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彩，写出了他们闪光的思想，人物的个性，也就通过他们的语言突出出来。

安岗确实很注意描绘人物的外貌，他的处女作《杨十三先生访问记》，写的是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在省工学院任教的造纸学家，他写道：

“杨先生是个很瘦而高的中年人，光头穿着黑大褂，足着土制的鞋，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预测他一定是位十足洋味的大学教授。现在一见面，却原来是个工人模样的学者。虽然，没有接谈，我对他的崇敬心已被他的朴素引起。”

这一段引语只向读者介绍了杨十三先生是一位衣着朴素的学者。作者在介绍杨十三先生的生活经历和他在造纸业上成就时，更

注意写出他的思想：

“……中国目下急切需要的是中等人才，而将来建设新中国者也就是中等人物。试看近日大学生一方感到失业，政府却又感到人才不够，因为政府所要的是肯干的人才，大学生往往养尊处优（肯干的人也有），去趟外国拿个博士便换洋钱花。这岂能做新社会的基础？我走遍各处，永穿这工人的衣服。我恐怕我一穿上长袍，便丢了我原来工人的立场。”

一位爱国家、爱人民的知识分子形象，通过朴素的语言，跃然纸上。

安正元访问的胡道远先生，在美国攻读过农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有中英文专著 4本，但热衷于在塘沽办工人教育。他认为要社会安定，国家进步，一定要把工人的不良习惯去掉，高尚的精神发扬。作者介绍胡道远调动青年的方法：

“他主要的调动方法是有一个坚强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方向，青年丢了信仰也就是成了‘迷途羔羊’，不知向哪里走好，东也撞西也撞，结果还撞不出什么。信仰是一个船上的舵，船失了舵只能在水中漂转，不能前进。胡道远说：‘在世界上做人，好比一盏灯，我们要加油，要放光……’”

安正元笔下的胡道远，是一位为实现理想而愿意踏实苦干、愿意作出牺牲的知识分子。

安正元采访的乡村民众教育专家胡勤业，却是一位热情而健谈的人。胡勤业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就研究民众教育。他认为“中国的被剥削阶级除农民群众以外，则为工人阶级，农工合计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乃中国革命的唯一的社会基础。惟在中国未工业化以前，非先解决乡农村问题，则都市问题更无从解决。”所以他跑到偏僻的乡村办民教馆，研究民众教育的途径。他在乡村办了 16个合作社，组织农民试验新品种；组织乡村医生为农民治病；办图书馆教农民读书看报；办夜校教农民识字，虽历

尽艰辛也在所不辞。

安正元笔下的人物，都是有思想、有抱负、有见解的人。他们的业绩和他们的思想完全一致，读来使人感到亲切，也令人信服，毫无矫揉造作、故意拔高之感。

安正元采访成功之处，依我看，在于他能够抓住每一位被采访人物的特点，提出被采访者乐意回答的问题，引导被采访者侃侃而谈。

有一天,他去访问东亚毛呢纺织公司的创办人宋棐卿先生。这位实业家看来不善言谈。当安正元首先问起他的生活经历时，他搔了几下头,眼望着天花板,思想了半天,不自然地笑着说:"这个问题太大，教我从何说起呢？"

但在问到他创办东亚毛呢纺织公司的经过时，这位实业家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谈到他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痛苦，顺利和艰难，还谈及制造毛线的技术经验。

当记者提出最后一个问题，请他谈谈对商界的批评时，他对于这个问题好似预备好了一般，喝了一口茶，便很快谈下去：

"我去西洋两次,没有一次不是抱定着为商的目的,看看人家，瞧瞧自己，我觉得我们中国商业有三种缺点：

1. 中国商人无远大的眼光——这也就是说，看不见世界，不能迎合潮流去做，只死守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子，而对于各方的知识全不能采取。

2. 拿大薪水的不卖力气，拿小薪水的倒得拼命——这是个最不好的现象。我认为凡是做领袖的，要首先去卖力气去牺牲，然后，别人才按你的榜样去做。以东亚而论，居于领袖地位的同事，没有一刻不按时到厂办公,年底批花红,则高等职员分文不拿,完全把他们的花红分给了工友。这样我认为才能领导一切，而被领导的方能口服心服去努力尽职。

3. 中国商人往往以一个人有钱无钱，而去崇拜或鄙视——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